

献县单桥与杜林登瀛桥都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在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其中，单桥还是世界最长的不对称石拱桥。日前，农民文史研究者赖宝国经考证确定，两座桥的建造者，都是被称为“石桥高士”的刘尚用。经不懈寻觅，最终找到了刘尚用的家乡、后人和生平故事，揭开了这位古代桥梁设计大师建造两座石桥的历史之谜。

登瀛桥、单桥双桥竟是一人造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魏志广 摄影报道

美丽而古老的滹沱河自西向东流经沧州大地。滹沱河故道上，有两座古老的石桥——登瀛桥与单桥，它们建造年代相近，仅间隔三四十年。经历400多年风雨沧桑，至今仍在在使用。关于这两座石桥，一直有不少美丽的故事和传说，但是，这两座桥有什么关联？始终没人能说清。

经过查找史料、对照出土石碑，农民文史研究者赖宝国日前确定：这两座桥的建造者，就是刘尚用，他的后人就生活在如今的杜生镇。

8月25日，我们与赖宝国一起，踏上了寻访“石桥高士”刘尚用、探寻登瀛桥与单桥建造秘密的采访之旅。

杜林石桥：桥畔有阁有塔文化厚重

第一站：杜林石桥，又叫登瀛桥。来到这里，最先映入眼帘的，是桥前的两尊大石狮子。石狮与石桥一样，历经岁月风雨，愈加古老苍劲。走上登瀛桥，大家一边缓步前行，一边仔细观看石栏上的精美雕刻和石柱上形态各异的神狮、石猴和佛像。

“石栏上刻的，是神话故事、古典戏剧、花卉飞禽等，四周空白处还刻着不少捐资人的名字，其中就有纪晓岚的祖上。”赖宝国说，登瀛桥是三孔敞肩拱形石桥，造型美观、结构坚实、雕刻精湛，在历史和建筑工艺上均有较高的价值。明万历22年（1594年），要在水流湍急的滹沱河上建造这样一座石桥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赖宝国是沧县杜林回族乡赖庄子村人，登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，省书协会员。他热爱地方文化，对杜林登瀛文化犹有研究。小时候经常到杜林



▲在献县石桥博物馆，赖宝国（右）查看明清石碑。

▼400多岁的登瀛桥如今桥上人来人往，仍在使用。



狮城百姓健康医院筹建党史馆

向社会征集相关纪念物品

本报讯（记者杨金丽）记者昨天从狮城百姓健康医院获悉，该医院欲建党史馆，现面向社会征集相关物件。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。“七一”前夕，沧州日报与狮城百姓健康医院举办“致敬百年党龄夫妻”活动，全国首个“百年党龄夫妻之

家”，也同时在医院揭牌。医院董事长贾建忠说，举办这次活动不是昙花一现，要想方设法让它持续下去，让老党员们的精神传承下去。他说，“百年党

桥博物馆，那里珍藏着献县2019年出土的“创建石桥碑记”碑。

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块残碑，仔细辨认后，赖宝国惊呼：“就是它们！我原来只通过献县文保所所长吕永森见过这些碑的拓片，今天也是第一次见！”

残碑上的字迹已经不甚清晰，陪同我们前来的单桥工作人员泼了一些水，骄阳照射下，字迹慢慢显露出来；“善士刘尚用、石守志、王自道曾建石桥于杜林河头……未满六年，桥已三孔告竣矣，三人功深果圆，炼汞成丹，一旦坐化而仙逝之……惜大事未完，伊谁任之？”

赖宝国介绍，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，单桥的建造者也是刘尚用。但是，建造单桥的刘尚用，是否就是建造登瀛桥的刘尚用？虽然两者年代相似，地理位置也不远，但因为缺少证据，一直没有定论。这块石碑立于清代顺治三年，它的出土，意义非凡：首先，它确定了单桥的建造者刘尚用，曾经在杜林河头建石桥；其次，它讲道，建桥者并非刘尚用一人，而是一个以刘尚用、石守志、王自道三人为核心的建桥群体，他们共同努力，建造了登瀛桥与单桥；最后，它确定了刘尚用等人的去世时间：在单桥修建未满6年的时候，三人先后离世，五孔石拱桥的单桥，此时刚刚竣工三孔，真是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。这块石碑，不见于史料记载，它的出土，破解了两座石桥的建造之谜。

记者探看其他石碑，多次看到“刘尚用”的名字。保存完好的“万古流芳”碑，是为纪念建造单桥的善人们所立。右起第一列文字就是“河间府献县乐善桥创建石桥高士刘尚用”，这座碑立于崇祯六年，说明当时人们称呼刘尚用为“石桥高士”。在另外几块残碑上，能看到“至若独肩其任，捐募若干，兼募零星以成是举者，为邑之善人刘尚用、石守志、张九叙等”，这说明以刘尚用为首的建桥群体，全部来自献县。

在斑驳古老的单桥上，我们见到了70岁的守桥老人秦植本。2006年，他接过本家哥哥秦植恒的班，义务守护单桥，至今已15年。对单桥的历史与传说，老人如数家珍。提到刘尚用，他说：“刘尚用是单桥的首功之臣！没有刘尚用，就没有单桥！那可真是了一位了不起的桥梁建造大师！”老人还热情地带我们去家中看他珍藏的《献县单桥》一书。

杜生刘宅：建桥故事家族世代相传

既然石碑上明确了刘尚用就是献县人，那他到底是哪个村的？赖宝国兴奋地说：“走！去杜生！那里还有他的后人！”按现在的行政区划，杜生并不属献县管辖。记者联系了献县文保所所长吕永森，他说，直到抗日战争前，杜生还隶属献县。



赖宝国（左）与刘尚用后人查看刘氏家谱。

车下高速，一路穿街过巷，在杜生一处农家院前停了下来。赖宝国说，他从2014年开始寻找刘尚用的家乡，开始毫无头绪。今年7月初，他又一次来到杜林探访，据村民介绍，40多年前，曾接待过给刘尚用上坟的后人，记得是杜生人。他马上找沧州市政协退休干部康秀芹帮忙。康秀芹向他推荐了杜生镇热心文化的刘忠秋。电话打过去，还没等赖宝国把话说完，刘忠秋就说：“我知道这件事，刘尚用的后人就在杜生，我们还很熟……”

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！赖宝国当即赶到杜生，找到了绿树掩映下的刘宅，一处农家院。

主人刘书琴是个爽朗汉子，今年74岁。他拿出家谱，指着上面的记载说，祖上这一辈是第5世，有尚用、尚美、尚仁兄弟3人。当年刘尚用20多岁，已经娶妻生子，决定建桥后，就说服家人，辞家为道，从此一心建桥，学习造桥技艺，化缘募集资金，终于在明万历年间创修登瀛桥、崇祯年间修建献县单桥，最终积劳成疾，在建造单桥与王母阁时离世。“我是第18世，时代虽然隔得久远，但是关于祖上的故事，我们家族是代代相传的。我小时候曾跟随大人去杜林给祖上上坟，对那座塔冢印象深刻。石塔高三四米，四周有围栏，还有石碑和功德碑，可惜后来毁坏了。家谱中的详谱也被毁了，世袭谱因为在布上而保存了下来。”

刘书琴说，刘尚用这一枝后来开枝散叶，全国各地都有。尤其杜生刘氏，很多都是刘尚用的后代。

刘宅院子里种满各种果蔬庄稼、花花草草，屋子里挂着书法国画，摆着造型各异的山石。侍弄花草庄稼，闲来独酌两杯，刘尚用的后人过着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。

400多年后，刘尚用当初建造的登瀛桥、单桥仍在在使用。桥上，人来人往，桥下，流水潺潺，一片岁月静好。把自己后半生都给了建桥事业的刘尚用，当初不会想到，多少年后，还有人念念不忘地寻找他，不仅寻找他的故事，也寻找这种矢志不渝、奉献苍生的精神。

龄夫妻之家”成立后，将专门设立“百年党龄夫妻之家”秘书处，由狮城百姓健康医院党支部书记负责，开设专门的服务热线服务于老党员。医院将在二楼辟出空间，形成一个小党史馆，把老党员的光荣事迹用图片、文字等形式展示出来，同时，向社会征集与党史有关的物件，如证书、奖章、衣物、照片、信件等，以丰富党史馆的馆藏，开展党史教育，弘扬红色文化。征集热线：3155702、2100120。

寻访早期共产党员莫子镇

《大公报》177次报道莫子镇

津门一代风流 原是地下党员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本报通讯员 张彦广

吴桥文史学者刘晓告诉记者，《大公报》报道莫子镇的信息，多达177次！这些报道真实记录了莫子镇在天津时期的活动情况。

按照目前掌握的史料可知，1926年，在刘格平的指导下，莫子镇在吴桥莫家场成立党支部，并担任党支部书记。但是，这之后，莫子镇仿佛消失了一般，很难从吴桥当地的史料中得到有价值的信息。直到发现上世纪30年代初的《益世报》（本报8月20日报道），才发现他在吴桥做过的事情。从1926年到1930年这段时间，莫子镇去了哪里？做过什么？一直以来都是个谜。

最近发现的《大公报》177次关于莫子镇的报道，正好破解了这一历史之谜。

地下党员打入津门上层

翻阅《大公报》关于莫子镇的这177次报道可见，这些报道主要集中在1928年到1929年。一年之间，一个人物出现在《大公报》上次数如此之多，堪称一代风流。

莫子镇的名字最早出现在《大公报》上，是1928年6月17日的《欢迎李生达进军津记》一文中。莫子镇是以“市指委员”的身份，代表“市指会”参加活动并致欢迎词。

刘晓介绍，“市指会”指的是天津市国民党部指导委员会（后改为执委），“市指委员”指的是天津市国民党部指导委员会委员。1927年，蒋介石“4·12”大屠杀后，莫子镇以地主家庭的身份打入国民党组织内部，1928年当选天津市指委委员，利用这一公开身份坚持革命斗争。刘晓说，从《大公报》可知，当时天津抓捕共产党的行动也很猖獗，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莫子镇能隐藏身份，秘密开展地下斗争，原因可能有二：一是他在北京入党，天津党组织了解他的人不多；二是1924年，他在新中国革命青年社天津分社从事党的活动时被捕，后被营救救出，派往日本留学。从日本归来后，一直在吴桥农村从事党的工作，便于隐藏身份。“这也是我们现在很难确定莫子镇具体入党时间的原因。”刘晓说。

1928年，莫子镇28岁，年轻有为，意气风发。在北洋大学学生反对校长事件中，他沉着应对；在讨论应付刺伤邮差事件时，他应对自如。

《大公报》关于莫子镇报道，一直持续到1931年他从日本留学归来。当年4月9日《大公报》上写到：“前市指委会执行委员莫子镇，自解职后，即于去岁赴日留学。兹闻莫氏于日前返津，准备结婚。闻其前妻，曾经登报脱离关系。现在结婚者，为常素珍女士，在西开某校肄业。婚礼定明日举行，惟莫氏已返吴桥原籍，今日即行返津。结婚地点尚未宣布。”这条新闻已经有点花边新闻的意思了。可见，莫子镇的影响力之大。

领导反日会运动为工人说话

在这177次报道中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。其一，是莫子镇在天津领导的反日会运动。

先来看一下1928年11月9日《大公报》的一篇报道：“日货登记问题，特市党部昨日开会，今后可望顺利进行。特市指委会，昨日下午二时，召集各机关各商行代表，讨论日货登记，及救国基金问题，到者约七百人。”接下来是各界代表发言。首先发言的，就是莫子镇。他说：“此次对日运动，全国一致进行，津商何独不能谅解？党部深知有人操纵，望小商人勿为利用，果酿成风潮，必貽外人笑柄。”接下来，各方表态，表示一定在天津广泛开展抵制日货、提倡国货运动。

参照史料可知，当年7月14日，日军故意用砖头砸伤一名车夫。8月5日，50多名日军到火车

站乘车时，因被忙于装运邮袋的工人阻塞，日军便用刺刀、皮带将几名工人打成重伤。8月8日，莫子镇以国民党天津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的名义，召集商、学、工、妇及教育、律师等各界代表在天津总商会开会，讨论成立天津反日会筹备事宜。23日天津反日会正式成立。反日会采用唤醒民众、提倡国货、抵制日货的方式，在天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。《大公报》不断跟踪报道，其中，劝说日货商人自觉登记、接受检查，也是反日会运动的方式之一。

1929年1月11日，《大公报》以《总工会联席会议中莫子镇之名言》为题，报道了莫子镇在这次会议中的发言。这次会议的背景是，英美烟公司发生工潮事件。会议认为，有人渗透进工人队伍中，带领工人闹工潮，所以解散了油、漆、瓦、木各工会组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莫子镇的发言可谓大唱反调。他说：“兄弟久想与诸君谈话，只因时间所限，未得如愿，甚觉抱歉。今天我所说，是组织工会之根本意义。诸君须知现下所受的痛苦，并非厂方所给，实由于社会制度不良，及政治黑暗，种种原因所致。增加工资、减少工作时间，这不是天津一个地方的问题，而是全国的问题。工人在政治上无地位。现时各政治机关，工人是不能进去的，所能进去者，尽为有产阶级的人。工人在政治上无地位，是真痛苦……何以工人不能参加政治，实因团体毫无力量。天津的工会，更属幼稚……”

莫子镇的这种观点，立刻遭到了天津英美烟草工会的反噬。他们提出议案，认为莫子镇“藉党营私，宣传赤化”，这件事多次出现在《大公报》的报道中。

主持天津迎葬孙中山大会

另一件事，是发生在1929年五、六月间的纪念孙中山迎榇奉安大会。

迎榇奉安大会是国民党为孙中山举行的迎葬大会。1925年，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，因留有遗言“归葬紫金山”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紫金山建造陵墓，1929年5月才完成。为了达到沿途宣传和扩大影响的效果，迎榇奉安大会实际分为两次，一是空车北上，二是实车南归。《大公报》详细报道了天津的这次奉安大会。5月21日，天津的北上迎榇宣传大会规模宏大，与会人数5万以上。作为指委，莫子镇上台演讲，当时的警备司令是傅作义，也上台演讲。《大公报》只刊登了莫子镇的演讲内容，傅作义则一笔带过。

6月2日，孙中山归葬南归，天津举办纪念总理奉安大会，莫子镇是这次大会的主席，他不仅代表各界献花圈，还在大会上致词。《大公报》上刊登了这份致词：“今天是总理安葬之日。我们想，总理去世已四年，因军阀阻梗，总理灵柩迄未南移，照遗命安葬。现在北伐成功，全国在总理遗教之下统一了，所以要将总理安葬于地下……我们睁开眼睛看一看，中国四万万同胞，有几人能效仿总理的人格、遵奉总理的遗教。其不能遵总理遗教，不信仰总理的，是为罪人。此辈假充信徒，则不配来纪念总理，总理也不接受他的纪念。再看一看，现在执政者，没有罪人，用他们来安葬总理，总理是永远不能瞑目于地下的……”身为共产党地下党员的莫子镇，以国民党指委的身份，在公开场合如此言说，这段话大有深意。

这件事后不久，6月21日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撤消了莫子镇的职务。但莫子镇依然在《大公报》的报道视线内。1929年8月27日的《大公报》报道“本市前指委杨亦周、莫子镇自离职后，即筹备放洋东渡游历。同行装旅费均已整备妥当。莫氏九月初即可登轮。杨氏已决定九月十日动身。”这说明，1929年9月，莫子镇再次赴日留学。